

沈福宗的歐洲之行及其影響

譚樹林*

沈福宗是清初順治、康熙時人，1681年隨比利時籍來華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赴歐，成為清初旅歐先行者之一，“是有歷史記載的最早來歐洲的中國文人”⁽¹⁾。在滯留歐洲期間，沈福宗曾遊歷荷蘭、意大利、法國、英國等六國，受到羅馬教皇、法英國王會見，並結識當地社會名流，藉此將中國語言文字、儒家道德哲學、中國古代科技等方面的知識介紹到歐洲，增進了歐洲對中國的真切瞭解和認識，極大地推動了歐洲早期漢學的發展。

16、17世紀是中西文化首次實現直接接觸、並漸趨交流高潮的一個時期，而該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者就是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歐洲來華傳教士。他們給中國帶來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文藝復興後的近代科學技術的同時，亦將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文化詳盡全面地介紹到西方，對歐洲思想界產生了深遠影響。英國學者赫德遜甚至認為：“18世紀歐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壓力和傳統信念的崩潰，使得天主教傳教士帶回來的某些思想在歐洲具有的影響，超過了天主教士在中國宣傳的宗教。”⁽²⁾赫德遜此論固然頗有見地，但亦存偏頗之處。因為他與前賢甚至時達存在一個共同的不足，就是僅僅矚目於那些不遠萬里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在東學西漸中的作用，而忽視了同時代赴歐的中國人在此方面的貢獻。實際上，幾乎與歐洲傳教士接踵來華的同時，亦有皈依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國教徒，以助理、隨從或翻譯的身份隨同傳教士到達歐洲，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將有關中國政治、歷史、文化、宗教、習俗等方面的知識介紹到歐洲。誠如有論者所指出的：“在當時中國與歐洲彼此阻隔、相互瞭解甚少的條件下，這些到過歐洲的中國人，無論長住或短留，無論有心或無意，都為歐洲帶去了有關中國的資

訊，從而為增進歐洲對中國的真切瞭解和認識作出了貢獻。”⁽³⁾而17世紀赴歐的中國天主教徒沈福宗(Michel Shen FoTsoung，或 Shen Fuzong)即是這樣一位傑出者。

沈福宗赴歐緣起

沈福宗的赴歐，完全是當時在華耶穌會傳教士精心策劃和安排的結果。沈福宗於順治十四年(1657)生於江寧府(今南京市)的一個天主教家庭，父母均為接受耶穌會士洗禮的天主教徒。他的父親是名醫生，與當時在江南一帶傳教的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過從甚密。也許是因這樣的家庭背景，成年後的沈福宗雖飽讀詩書，學識淵博，卻沒有參加被當時讀書人視為正途的科舉考試，而是受洗成為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並從柏應理學習拉丁文。

耶穌會傳教士自明末踏跡中土，利瑪竇等深深體會到要想在中國順利傳播基督教理，必須儘量避免與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發生正面衝突，因而在宣導“學術傳教”策略的同時，對中國固有的習慣與習俗，諸如敬孔、祭祖等採取了容忍態度，使得明末一度出現天主教在華傳

*譚樹林，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

教的輝煌局面。滿清政府代明而立後，對天主教仍採取優容政策，加之國內局勢逐步趨向穩定，是非常有利於西方傳教士開展傳教活動的。但是，1664年以楊光先為首的一批清廷大臣發起了反對西洋傳教士及西洋曆法的教案，史稱“熙朝曆獄”。西洋傳教士悉數被趕離教區，驅逐到廣州與澳門，使西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受到沉重打擊。幸賴喜好西洋文化和器藝的康熙帝明察秋毫，1668年下令重新驗證新舊曆法，結果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以新法測時分毫不差，康熙帝乃下令罷黜回人楊光先，重新啟用南懷仁等西洋傳教士。1676年南懷仁出任中國傳教區副區長。他認為，為恢復和發展受到沉重打擊的傳教事業，多派一些既精通哲學與神學又能迅速適應中國習俗的傳教人員是極為必要的。因此他給歐洲耶穌會寫信，積極要求增派耶穌會派傳教士來華工作。同時，鑒於愈演愈烈的中國“禮儀問題”給傳教事業帶來的影響，在華傳教士也想把康熙皇帝對“儀禮問題”(Question des rites)的立場向羅馬教廷陳述，以探討羅馬教皇對此問題的看法。這樣，便有了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的返歐之行。

柏應理字信末⁽⁴⁾，1623年5月31日⁽⁵⁾生於比利時的麥赫林(Mechlin)。他自小在當地耶穌會學校讀書，十七歲時成為耶穌會的一位見習修士，並夢想有朝一日能赴海外向異教徒宣教。1654年，柏應理在聆聽了剛剛從中國返歐的意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有關中國情況的報告後，萌發了去中國傳教的強烈願望。同年，他和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被按立為牧師。1656年，他隨波蘭籍耶穌會士卜彌格(P. Michael Boym)、魯日滿離歐赴華。⁽⁶⁾途中幾經險阻，於1658年抵達澳門，同年12月獲准入內地，先後在江西、福建、湖廣、浙江、江南等省傳教，尤以在江南傳教時間最長，主持過松江、上海、嘉定、蘇州、鎮江、淮安、崇明等地教務。因傳教成就突出，1679年被選任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區司庫。由於他熟稔中國教務，理所當

然地被南懷仁選中，承擔起回歐彙報和向耶穌會總部及羅馬教廷求援的任務。行前，柏應理決定帶幾名中國教徒隨行。因為那個時期的“耶穌會傳教士為傳教工作返回歐洲時”，有帶上中國人“這個奢侈的習慣，其目的有兩個：一是到處炫耀這些隨行的中國人，是要證明他們在中國傳教的成績；二是除了為自己做家務外，這些中國人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即在被要求翻譯一些難懂的中文著作時，他們就成了活字典”⁽⁷⁾。後來沈福宗在歐洲的所為，即可證明耶穌會士的這種考慮是頗有道理的。另外，此舉恐怕還有一個用意，就是藉歐洲之行，將他們培養成合格的中國籍神職人員。

明末清初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在積極開展教務的同時，已開始注意到培養中國籍神職人員問題。特別是明末爆發的沈淮教案驅逐歐洲傳教士，其間奉教士大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在保護傳教士免遭迫害、保障傳教工作順利開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康熙帝時，回人楊光先掀起教案(1664-1672)，所有傳教士都被驅逐到廣州，此間教務惟賴中國籍羅文藻神父一人，祇有他尚能留居教區施行聖事。他還受託到各教區巡視教友，代理教務。他由廣州出發，在數年中走遍中國十省，即廣東、福建、山東、河北、吉林、江西、湖南、四川等，“在無形中他統理中華全國教務，成為教難中唯一的宗徒”。他到處宣揚福音，兩年間付洗三千人。羅文藻於教案期間在傳教救靈上所建立的“如此奇功”，極為西洋傳教士所欽慕，“一致稱揚他為中華唯一傳教士”，甚至“越南暹羅各地主教亦同聲歌頌中國司鐸的傳教成就”⁽⁸⁾。這次教案的經歷使羅文藻認識到：“欲求聖教會發展於中國，必需有中國司鐸參加工作，方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成果。”⁽⁹⁾耶穌會第一位中國籍司鐸鄭瑪諾也指出：“目前欲使當地教友能繼續獲領聖事，除派遣本國神父以外，別無他途可循。他們極易化裝潛往各處，而歐洲人絕無可能。本會省會長對此事已有瞭解，但無人可遣，因過去不願錄用中國司鐸。在

此緊急關頭，非本國司鐸，不足以挽救危局”，並認為“此事如不迅即付諸實施，已往傳教事業將盡成泡影”⁽¹⁰⁾。中國籍司鐸的倡議，特別是羅文藻在教案中做出的宗徒事業，使聚集在廣州的來華歐洲傳教士感到培養中國籍神職人員的必要性。

然而，在如何培養中國籍司鐸的方式上存在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在中國本地培養，這樣可以節省花銷；另一種認為在中國缺乏必要的語言和宗教環境，難以培養出合格的當地司鐸，主張選取年輕優秀的中國教徒送往國外培養。後一種意見得到在華的法國耶穌會士的支持，因為他們感到“在中國頗難使一司鐸必具拉丁文及其他科學等學識有所深造，故決定遣派中國學子數人赴法留學”⁽¹¹⁾。因此，他們挑選若干年輕的中國教徒由專人負責，教以神學、拉丁文等課程，然後送往歐洲深造，學成後返回中國擔任神職。首先將其付諸行動的是法國耶穌會士陸德（Alexandre de Rhodes）。⁽¹²⁾陸德1623年抵澳門，以安南為主要傳教地，有“安南使徒”之稱。⁽¹³⁾他曾因竭力主張栽培當地人士為司鐸而被後世史家譽為“甚有遠見”之人。1645年，陸德神父提議率領中國及安南北圻、南圻少年各一人赴羅馬深造。會長以經濟困難為由，祇允許帶鄭瑪諾一人前往。鄭瑪諾，字惟信⁽¹⁴⁾，廣東香山嶼人，生於1635年。他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與陸德相從甚密，鄭瑪諾即由其施洗。途中歷經五年，1650年抵達羅馬。1651年10月入耶穌會聖安德勒初學院學習，1653年秋，鄭瑪諾發宏願加入耶穌會，進羅馬公學深造，學習修辭學、哲學、物理學等。畢業後在該校擔任教職，教授拉丁文、希臘文法和拉丁希臘文學。“一個中國人在歐洲文藝復興的中心——羅馬，著名的學校中教授希臘文學，在歷史上，尚無先例。”此舉無疑會給中國人贏得較高聲譽。1660年，鄭瑪諾繼續攻讀神學。1662年4月，鄭瑪諾到里斯本候船返國，其間他曾到科英布拉大學就讀。1666年4月，在受到葡王召見後，和其他十四位傳教士自里斯本揚帆東渡，10

月到達果阿。但耶穌會當局不允鄭瑪諾回國傳教，至於原因，“或因楊光先教難，教士被遣；或因清廷為防止鄭成功反攻，而實行沿海遷民政策，乃使耶穌會有此決定”⁽¹⁵⁾。總之，鄭瑪諾沒有立即回國。1668年8月，鄭瑪諾抵達澳門，在廣州周圍傳教兩年後，1671年9月，鄭瑪諾隨同奉命晉京供職的閔明我（Dominicus Navarrete）、恩里格（Christianus Herdtricht）到北京，從事傳教活動，1673年5月死於肺癌。

此後，不斷有中國教徒隨傳教士到過歐洲：1645年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返歐時帶了一名中國教徒，教名為多明（Dominique），1653年到達歐洲。多明曾幫荷蘭東方學家高利烏斯（Jacob Golius）整理了一些他收藏的中文抄本，英國人錢伯倫（John Chamberlain）亦稱在他的一部著作中介紹中文時所使用的漢字，是多明用毛筆書寫的⁽¹⁶⁾；波蘭傳教士卜彌格代表永歷朝廷出使羅馬，也帶了兩名教徒徐安珠和郭約瑟夫。⁽¹⁷⁾據方豪神父統計，同治前赴歐洲學習教務、以期返華擔任神職的中國留學生共一百一十四人。⁽¹⁸⁾這些中國教徒的歐洲之行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來華傳教士中，柏應理是利瑪竇傳教政策的堅定擁護者。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發達、有着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要使天主教發展壯大，必須培養中國本土神職人員，以中文舉行彌撒，甚至用中文傳教。柏應理認為：中文缺乏一些拉丁文中存在的特定的發音，這使得中國神甫在舉行聖事時難以發出這些音節，從而影響了舉行聖事的效果。加之中國人不懂拉丁文，用拉丁文傳教就毫無意義。如果讓成年人學習拉丁文，既不現實也無可能，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利用中文傳教。同時，應重視培養中國本土神職人員，尤其是在教難期間，祇有他們才能自由地傳播上帝福音。⁽¹⁹⁾柏應理還把自己的這一想法在1684年謁見羅馬教皇時向教皇進行了陳述。自身有這樣的理念，加上有上述這些成功的先例，柏應理返歐要帶中國教徒同行，就顯得絲毫也不奇怪。

這次中國傳教區最初選出五人作為隨同柏應理赴歐的候選人，最後確定兩人入選，即時年二十五歲的沈福宗和年已五十的吳曆。吳曆字漁山，號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琴、詩、書、畫均富盛名，誠如方豪神父所言：“在中國天主教史上元、明以來，能兼擅詩、琴、書、畫的，亦吳曆一人而已。”⁽²⁰⁾據史料記載，吳曆自幼即領洗，而為其施洗之人，就是柏應理。⁽²¹⁾儘管已經受洗，吳曆四十歲前與僧人交往頻繁，四十歲以後才開始與天主教友交往。其交往的天主教友人中，可確知的即有孫元化外孫侯大年、沈惠于等。吳曆與耶穌會傳教士魯日滿、柏應理過從甚密。正因如此，柏應理赴歐時，吳曆被選中，準備赴歐深造。1680年他們一行抵達澳門，次年12月準備乘荷蘭商船赴歐，然而吳

曆最後沒有赴歐。至於其中原因，據吳曆說是因為“院長某請留修省，免數萬里跋涉之勞，於是西行之意絕”。這裡的“院長”指的是聖保祿學院院長。該院是針對遠東地區的傳教需要，為培養獻身教會事業的傳教士而於1594年在澳門成立的，學院以中文課程為主，另設有拉丁文、神學、哲學、數學、醫藥學、物理學、音樂等，學生畢業取得證書，即具備了入華傳教的資格。從建校至18世紀末，從聖保祿學院學習後進入中國傳教的知名傳教士就達二百餘人，熊三拔、艾儒略、金尼閣、湯若望、南懷仁等這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相當有名的人物都曾在該學院就讀或



〔圖1〕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

任教，因而聖保祿學院在傳教士和教徒中聲譽極高。既然在聖保祿學院亦可以接受到較為系統的天主教教育，吳曆可能是考慮到自己年事已高，為避免經受海上長途航行勞累，他接受了聖保祿學院院長的建議，入聖保祿學院學習。吳曆有詩集《三巴集》傳世，前三十首為《澳中雜詠》，皆有關澳門者，其中第二十九首云：“西征未遂意如何，滯澳冬春兩侯過；明日香山重問渡，梅邊嶺去水程多。”自註：“柏先生約予去大西，入澳不果，則西行之約，究未之踐。”⁽²²⁾此外，吳曆還創作了幾首懷念柏應理西行的詩⁽²³⁾：

風舶奔流日夜狂，誰能穩臥夢家鄉？
計程前度大西去，今日應過赤道旁。
註曰：“計柏先生去程，應過赤道。”

征帆出海渺無津，但見長天不見塵。
一日風波十二險，要須珍重遠歸身。

春風日日送行旌，誰送天涯九萬程？
自古無情是楊柳，今朝欲折昨朝生。

據上述可以確證，吳曆未曾赴歐。寓居澳門的吳曆於1682年加入耶穌會。據陳垣〈吳漁山與王石穀畫跋〉：“（漁山）入耶穌會學道，習蠟頂文。七年學成，膺神職，歸滬，時康熙二十七年。”⁽²⁴⁾按康熙二十七年為1688年，即陳垣認為吳曆是在經過七年的學習後，於1688年在澳門晉陞司鐸後，回滬傳教。主持祝聖司鐸儀式者為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與吳曆同時晉陞司鐸的還有劉蘊德、萬其淵二人。⁽²⁵⁾晉陞司鐸後的吳曆回內地後，主要在上海、嘉定一帶傳教，影響頗巨。當然，如果吳曆真的隨船去了歐洲，憑他在琴棋書畫等方面的修為，一定會對西方美術界產生重大影響。

沈福宗遊歷歐洲的歷程

1681年12月5日（一說12月3日），柏應理和沈福宗等三人乘荷蘭商船放洋西行。⁽²⁶⁾不幸的是船在爪哇出事，在巴達維亞耽擱了一年多，後搭上一艘荷蘭商船繼續西航，於1683年10月8日抵達荷蘭。⁽²³⁾這時，一位名叫彼得·湯姆斯·萬韓默的耶穌會士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684年3月21日，沈福宗一行抵達柏應理的家鄉梅赫林，並拜訪了他們的家人。他們為柏應理一行的漫長旅行舉行了一場感恩彌撒，柏應理主持，沈福宗作為助祭，所用的祭臺布和彌撒禮服，均為徐光啟孫女徐太夫人親自製作。柏應理與她稔熟，在江南傳教期間教務頗得其幫助與支持。徐太夫人對傳教

事業極為慷慨，曾一次周濟二十五位傳教士的銀兩即達五千五百多兩：她在故鄉捐建教堂三十五座，在其它各省九座，所以柏應理認為：“在全國，恐無一聖堂、一祈禱所、一教區、一善會，不曾沾夫人之恩。”⁽²⁸⁾得悉柏應理等返歐，徐太夫人率松江全體女教友捐製金聖爵一尊，還有親繡的祭衣數襲。但不幸的是，徐太夫人在柏氏返歐前的1680年陰曆九月初三日去世。柏應理感念其對傳教事業的支持，為了紀念徐太夫人，柏應理以拉丁文撰寫《一位中國奉教夫人許甘第大傳》並於1688年在歐洲出版。柏應理著述此書的目的，固然有頌揚徐太夫人對傳教事業的慷慨支持之意，然其根本的目的在於藉此引起歐洲女教友對中國傳教事業的關注，向歐洲女教友募捐。對此，柏應理在原書結語中有坦白說明：

余作此篇，並無別意，祇是要歐洲士女稍稍認識這位夫人的大功大德，做做遺範，慨然相助中國傳教事務。⁽²⁹⁾

該書的確達到了柏應理所期望的效果。繼拉丁文版後，同年即出版法文版，西班牙文、弗拉芒文等亦相繼出版，在歐洲尤其女教徒中產生了強烈反響。她們紛紛慷慨解囊，捐助中國傳教事業，其中捐助最多的，如西班牙的雅凡意洛（Aveiro）公爵夫人、法國的洛美里尼（Lomellini）夫人、比利時盎凡爾斯的姊妹三人。⁽³⁰⁾

柏應理主持彌撒儀式完畢後，人們為他們演出了一場希臘劇以示慶賀。⁽³¹⁾而後，他們趕往巴黎。一路上，彼得·湯姆斯·萬韓默學習拉丁語。

1684年9月3日，他們一行人來到巴黎郊外的蒙特馬特。兩天後，他們訪問了巴黎法國皇家學院，拜會了皇家學院的一些數學家，他們送給柏應理等幾件數學儀器。1684年9月15日，他們來到凡爾賽宮，謁見法王路易十四。當引見沈福宗時，他以謁見中國皇帝的禮儀行三跪九叩大禮，但當叩了三四下後，被路易十四制止。在這次接

見時，柏應理獻上一些中國畫和古玩，路易十四對這些禮物非常感興趣，回贈許多盤纏供作回程的路費。⁽³²⁾第二天，國王又接見他們，彼得·湯姆斯·萬韓默對此有詳細記載：

次日，在國王用膳時，我們被安排去覲見法國國王。當我們一出現時，國王就下令讓出一條路讓我們靠近一些，要柏應理和沈福宗走到太子和太妃們坐的桌前來。國王問柏應理一些問題，又問他是否見過噴泉。柏應理回答說沒有，不敢非想，因為這種禮遇是使節和高級王公所享受的。國王認為他們應該看看，立即下令等一會兒他們進花園時，要打開噴泉。⁽³³⁾

當着大家的面，國王要沈福宗用漢語大聲地背誦《天主經》、《萬福瑪利亞》和《教義》等經文。昨天，由於太妃們見到沈福宗用小象牙筷子夾東西吃，感到特別新鮮；今天又要求國王再看他吃一次，僕人立即端上盛有食物的金盤，沈福宗在國王桌前表演了如何使用筷子。而後，眾人來到花園欣賞噴泉。

很可能就是在路易十四舉行的宴會上，沈福宗結識了法國首相盧瓦 (François Michel Le Tellier Louvois)。盧瓦為柯爾伯 (J. B. Colbert) 繼任，他與柯爾伯一樣，也鼓勵在中國進行科學、技術調查。我們知道，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早有在遠東拓展勢力之計劃，祇是幾次努力均告失敗，但法國政府並未因此放棄努力。1682年，南懷仁在1678年8月15日所寫的呼籲增派耶穌會士來華的信件在法國公開發表，引起強烈反響。幾乎與此同時，1680-1681年間，巴黎天文臺臺長、著名科學家凱西尼 (G. D. Cassini) 向首相柯爾伯 (J. B. Colbert) 提交了一個關於派遣耶穌會士數學家去東方進行天文觀測的計劃。柯爾伯召集天文學家臘義爾 (P. de la Hire) 和耶穌會士數學家洪若翰等討論後，提出了一份詳細計劃報告。⁽³⁴⁾但是，這項精心設計的計劃卻沒有得到立即實行。究其原因，葡萄牙遠東“保教權”的限制、法國

尚無直航中國的船隻可能是重要原因，當然也與大力支持這一計劃的首相柯爾伯在1683年去世有關。1684年9月，來到法國的沈福宗與柏應理，在覲見路易十四時，陳述向中國派遣傳教士對發展宗教和獲得科學知識都很重要。路易十四本就支持派遣傳教士去中國，沈福宗法國之行對中國文化及習俗的介紹無疑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路易十四命盧瓦具體負責選拔人選，1685年3月，洪若翰 (J. de Fontaney)、白晉 (Joachim Bouvet)、劉應 (Claude de Visdelou)、張誠 (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等六位耶穌會士被選中前往中國。⁽³⁵⁾他們被授予“國王數學家”的稱號，之所以被選是因為他們都具有高深的科學造詣，法國19世紀最著名漢學家之一的雷慕沙 (Abel Remusat) 曾高度讚美“國王數學家”，認為“此為百年以來法國教士團首次出現的精英”⁽³⁶⁾。當代法國著名學者衛清心亦認為：“這些偉大的傳教士既是上帝的使臣，又是法國國王的非正式代表，同時也是歐洲自然科學的盜火者。”⁽³⁷⁾可見，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科學家的重要動機之一就是開展學術研究。可能正因如此，為首的洪若翰在1687年11月8日寫給法國皇家科學院的信中，專門彙報了他們的科學分工：

洪若翰負責中國天文學史和地理學史、天體觀測，以與巴黎天文臺所做的天文觀測相比較；劉應負責中國通史，漢字與漢語的起源；白晉負責動植物的自然史和中國醫學的研究；李明負責藝術史和工藝史；張誠負責中國的現狀、員警、官府和當地風俗，礦物和物理學(指醫學)的其他部分，即指白晉研究以外的部分。⁽³⁸⁾

這些“國王數學家”的確不辱使命，抵華後皆有傑出的表現：

白晉之易經研究，張誠對滿洲地區地理之詳細報導，洪若翰的天文研究，及被雍正皇帝稱為“耶穌會中最有能力的”劉應，對於書經

及易經之研究，均是前所未有的（……）由白晉創立的Figurists團體對於《易經》及中國上古史的解釋，不僅影響了萊布尼茲的數學及哲學思想，且使歐洲宗教及哲學界譁然。李明的《中國新回憶錄》（*Mémoires Nouveaux*，即《中國現勢新志》——筆者），對中國宗教與政治、風俗等有詳細介紹（……）近代西方學者論及耶穌會士與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之著作中，鮮有不提及李明及其著作者。⁽³⁹⁾

他們以自己傑出的工作深得康熙皇帝的歡心。1697年5月，白晉作為康熙特使到達巴黎，將康熙帝給路易十四的四十九冊漢文書贈送法蘭西國家圖書館，並於同年出版《中國現狀》和《康熙皇帝》。這兩部書對製造出一種關注中國的氣氛很有幫助，而這種氣氛發展的結果導致18世紀“中國風尚”的盛行。白晉返華時，包括巴多明（D. Parrenin）、杜德美（P. Jartoux）等十一位傳教士來華，他們中有的在宮中任職，有的參加了康熙年間的全國地理測量，對繪製清代皇輿全覽圖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幾個人後來成為18世紀法國最出色的漢學家”⁽⁴⁰⁾。

在他們的感召下，至18世紀中葉，又有一些法國耶穌會士如宋君榮（A. Gaubil）、韓國英（P.-M. Gibot）、蔣友仁（M. Benoist）、錢德明（J.-J. Amoit）等相繼來華，在服務清廷的同時，開展科學研究，他們以書信、考察報告等形式發回在華科學活動的內容，在歐洲科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奠定了西方漢學研究的基礎，號稱歐洲漢學三大奠基之作的《中華帝國全志》、《中國叢刊》和《耶穌會士書簡集》即是以法國在華耶穌會士的書信、報告、翻譯以及著述編撰而成的。有論者認為：“法國耶穌會士在18世紀的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對於歐洲的‘中國熱’，他們同樣起了催化作用，因為許多歐洲人，其中包括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學者和知識份子，都是在讀了他們的有關中國的著述以後，才對中國發生興趣，進而研究中國的。”⁽⁴¹⁾誠為的論。

1864年12月7日，柏應理與沈福宗又來到羅馬，準備謁見教皇，向教皇彙報中國的傳教情況，以博得教皇的欣賞和支持，這是他們此行的核心任務。1685年6月6日，他們終於受到教皇接見。接見時，“教皇不像平常一樣端坐在王座上，而是坐在一張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打開的每日祈禱書。柏應理匍匐在地，抱着教皇的腳。教皇首先感謝柏應理送給他中國書籍；爾後，詢問柏應理是否還要回中國。柏應理回答：是的，而且他還要帶幾個同伴去，因為在華的傳教士太少了。教皇問他回去走的是哪一條路，柏應理回答從葡萄牙到果阿，然後再到澳門。教皇又問，路上要花多少時間？柏應理答曰：從葡萄牙到果阿，要在海上航行八個月；從果阿到澳門，通常要花三四個月，不少人都在這漫長的艱難旅途中喪命。聽罷柏應理的回答，教皇沉默後說：這確實是一條艱難而漫長的旅途。柏應理進而向教皇提出在中國用中文做彌撒的問題，教皇並沒有完全拒絕柏應理的請求。經一小時會談後，教皇為他們祝福，他們再次抱着教皇的腳辭別。教皇最後還許諾，不久還要接見他們，並送給他們東西”。⁽⁴²⁾在接見中，教皇還把身着中國服裝的沈福宗讚揚了一番。

第二次接見時，柏應理和沈福宗毫無顧忌地又提出了在中國用中文做彌撒的問題，教皇回答他將在即將召開的紅衣主教會議上討論和解決。而最終這個問題仍懸掛在那裡，沈福宗的出現看來也沒有引起教皇的格外注意，因而，原來企望得到教皇支持的計劃落空了。在羅馬期間，沈福宗曾向羅馬耶穌會會長申請要求加入羅馬耶穌會，祇獲准在完成陪伴柏應理的歐洲之行後，當個葡萄牙的見習修道士。值得一提的是，逗留羅馬等待教皇接見期間，沈福宗把精力用在學習拉丁文上，他用拉丁文造句和談話，有時也用意大利語交談，儘管他那時還沒有完全學完古拉丁文，卻完全可以用拉丁文進行談話和書信交流。彼得·湯姆斯·萬韓默在第二次謁見教皇后，便離開了柏應理和沈福宗，被派往墨西哥傳教。

1686年初至1687年初，柏應理為其著《四書直解》出版之事，帶着沈福宗再次來到巴黎。在這段時間裡，沈福宗幫助不少法國人學習中文，耐心解答有關中國的問題。熱心的巴黎人把沈的肖像製成銅板畫，並拿到市上出售。畫上的沈福宗看起來嚴厲而近於陰險，所穿的衣服頗似中國的平民裝而非僧侶服，也比他的實際年齡老了许多。

1687年3月，沈福宗由斯皮諾拉（Spinola）神甫陪同離開巴黎去英國。4月，他出席了倫敦的天主教大主教的就職儀式，所到之處都為之轟動。據說“英國人都對他很友好”，英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本來對中國歷史文物很感興趣，並閱讀過有關中國的書籍，所以“很喜歡他”，不僅接見沈福宗，而且賜他宴會，甚至讓“他住在宮廷裡，過着奢侈的生活”⁽⁴³⁾。詹姆斯二世還命令宮廷畫師克內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在溫莎堡為沈福宗畫了一幅身着中國服裝的全身油畫像。從畫像上看，“沈福宗中等個子，顯得很年輕，穿長袍，留長辮，相貌清秀、沉靜，有尊嚴，有自信，一雙明亮的黑眼睛，尤其顯得聰明”。當時人評價說：“這是Kneller爵士最好的一幅作品，畫中人與沈福宗本人酷肖。”畫像完成後被掛在離國王臥室不遠的地方，該畫現由英國王室收藏，1991年曾在英國國家畫廊展出。[圖2]即為這幅全身油畫像的照片。⁽⁴⁴⁾這幅肖像畫與法國銅

板畫像的嚴厲神態截然相反，這是一幅優雅而生動、更接近真實的畫像。

沈福宗在英國一直待到1688年年初。4月16日，柏應理和沈福宗一起來葡萄牙里斯本。此後，這位曾轟動歐洲一時的新聞人物就銷聲匿跡，據說沈福宗進入了葡萄牙的修道院當見習修



[圖2]沈福宗全身油畫像。畫中的沈福宗中等個子，穿着長袍，留着長辮，相貌清秀、沉靜。關於此畫像的作者及收藏地，目前仍存在爭議。徐劍梅認為此畫像係英王詹姆斯二世命宮廷畫家克內勒（Godfrey Kneller）爵士在溫莎堡為沈福宗繪製，現為英國王室收藏，1991年曾在英國國家畫廊展出，徐氏曾親眼目睹。徐劍梅：《“倫敦眼”牛津的中國色彩》，新華網：2004-06-02。而法國學者雅克·布羅斯（Jacques Brosse）則認為此畫是沈福宗隨柏應理謁見法王路易十四時，法國宮廷畫家所畫，此畫現藏於巴黎國家圖書館。見（法）雅克·布羅斯著，耿昇譯：《發現中國》，頁64，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

道士。葡萄牙的耶穌會士也證明在幾年的修道院生活後，沈福宗和斯坦波夫、金里安等三位德國耶穌會士一道乘船去亞洲，途中遇上時疫，祇有斯坦波夫一人倖存。在莫桑比克，斯坦波夫給當地耶穌會士留了一封信，要他們轉交給次年赴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信中敘述了沈福宗的悲劇——

1691年9月2日，抵達莫桑比克的前一天，死於傳染病。⁽⁴⁵⁾原信已不復存在，但馬萊特斯塔·愛德華的文章中卻描述了第二年隨船來華的柏應理途經此地時，獲悉沈福宗死訊的傷心情景。⁽⁴⁶⁾

沈福宗歐洲之行的影響

沈福宗作為一位清初旅歐先行者，實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不該被人忘卻的人物，特別是在中學西漸史、西方漢學發展史上，他的歐洲之行所產生的影響更為深遠。

首先，沈福宗滯留歐洲期間，曾遊歷荷蘭、意大利、葡萄牙、法國、英國等歐洲六國，受到羅馬教皇及法、英兩國國王會見，廣結當地社會名流，向他們現身介紹了中國。17世紀前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大多是通過進口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商品，以及在亞洲的歐洲傳教士寄回的書信和報告，還有就是來自那些到亞洲貿易的商人和水手的所見所聞。但是，無論傳教士寄回國內的書信和報告，還是商人和水手的見聞和敘述，都不免摻雜介紹者認識上的主觀因素。耶穌會士李明（Louis le Comte）曾這樣評論那些從事東方貿易的商人的報告書：“在這方面，情況也是如此：那些遊歷家們常常欺騙我們，因為他們自己也早已受他人之騙。有多少人，他們到一個新的國家，就自以為可以一眼便通曉所要知道的一切！他們一登岸，便四處奔走，見到甚麼就貪婪地快口大嚼，好像餓夫饑不擇食似的；在他們的記述中充滿了道聽途說和庸俗的無聊之談。”⁽⁴⁷⁾傳教士的記述同樣也為人所詬，法國人馬布里（Gabriel Bonnot de Mably）在談到傳教士的中國報導時說：“他們的敘述充滿矛盾，令人無法相信。我一定要弄明白，為甚麼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歷史都沒有任何說不清楚的事，而中國的歷史卻盡是些找不出原因的事件，而且也與人的本性背道而馳。”⁽⁴⁸⁾而旅行家的記述則更不可靠：“甚至有些旅行家從來沒有遊歷過全境，或者僅僅見到邊境地帶，並且祇有借譯人及手勢之助才能和

當地人互相通話。”⁽⁴⁹⁾所以利奇溫認為：“即使到17世紀，最不能使人置信的傳述，還是被人們信以為真。”⁽⁵⁰⁾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一個化名普沙馬納割·喬治的法國騙子，他在西歐到處遊騙，自稱是臺灣土著人，並煞有介事地介紹評論中國文化，竟多年未被人識破。⁽⁵¹⁾這樣的局面，無形中把中國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而沈福宗在歐洲的出現，以現身說法介紹中國，加深了歐洲人對中國的客觀、真實的認識，引起了人們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如前揭所示，在歐洲人眼中，甚至中國人使用筷子也成為新鮮事。在路易十四舉行的宴會上，沈福宗應邀兩次表演用筷子吃飯。另外，沈福宗還向路易十四等出示了孔子像，表演了用中國毛筆寫字的技巧，並介紹了有關中國漢字的知識。當時法國《風雅信使》（*Mercure Galant*）雜誌9月25日的一篇通訊“稱讚中國有八萬字，需費時三十年方能熟習，可見中國人記憶力之強，和想像力之富，並稱中國有很多學校和救濟院，不見有乞丐。也提到雙親故世後，即埋在平地上，禮節隆重，並須叩頭”⁽⁵²⁾。沈福宗是受法王接見並賜參加王宴的第一個中國人，頓時成為巴黎的新聞人物。前引《風雅信使》（*Mercure Galant*）雜誌的一篇通訊寫道：

他（指柏應理神父）帶來的中國青年，拉丁語說得相當好，名曰Mikelh Xin。本月十五日他們二人到凡爾賽宮，獲蒙皇帝召見，在河上遊玩，次日又蒙賜宴。⁽⁵³⁾

沈福宗在遊歷期間，除受到羅馬教皇和英、法兩國國王接見外，也廣結社會各界名流，在解答他們有關中國問題的同時，將中國社會政治、宗教、文化、習俗等方面的知識傳到歐洲，使他們有了更為直觀的中國印象。當時歐洲正盛行“中國風尚”（*Chinoiserie*），沈福宗的適時出現所引起的轟動，促使歐洲各界對中國的興趣和關注，對“中國風尚”無疑起到了更大推進作用。



【圖3】沈福宗神父向西方人介紹他的時代中國上層社會的飲食文化，提到主人的位置要高於其他的客人等，杯中酒要一飲而盡，不留一滴。旁邊還有演奏者。此圖在西方被廣泛利用。

其次，推動了歐洲漢學的發展。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沈福宗、柏應理將許多中文典籍及教友的中國典籍拉丁文譯本帶往歐洲，為歐洲早期漢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柏應理、沈福宗出國時隨身帶有中國儒家經典、諸子書籍以及傳教士譯著多部，這些書籍除南懷仁所贈外，徐太夫人在柏應理行前也“贈教士所著中文書四百冊，獻呈教皇”^{（54）}。柏應理、沈福宗在謁見教皇英諾森十一世（Innocent XI）時，將這批書呈獻給教皇，它們被藏入梵蒂岡圖書館，成為該館擁有的早期

中文典籍藏本。在謁見路易十四時，沈福宗等將《大學》、《中庸》和《論語》的拉丁文譯作獻給路易十四，請求批准在法國出版。路易十四在聽取了內容介紹後，下令刊行。1687年，《中國哲人孔子，或以拉丁文出版的中國學說》在巴黎正式出版。書的扉頁上印有中文書名《西文四書直解》，但實際上缺少《孟子》。《孟子》未被收入的原因，大致有三個方面：1）《孟子》在四書中篇幅最長，將其全部翻譯顯然費時太長；2）《孟子》中許多關於人性本善的論述，與天主教聲稱的人生來即帶有原罪，祇有信奉基督教才能

得到贖救的教義大相徑庭；3)《孟子》中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論述，與天主教神職人員的不婚不仕針鋒相對。⁽⁵⁵⁾

《中國哲人孔子》包括四部分：書首是柏應理寫給法國國王的〈獻辭〉，接下來是〈導言〉，之後是〈孔子傳〉。〈孔子傳〉以孔子雕版肖像開始，這是歐洲出版物中較早的孔子畫像。〈孔子傳〉之後依次為〈大學〉、〈中庸〉、〈論語〉的譯文和註解，最後附有柏應理編寫的〈中國皇朝紀年表〉以及他繪製的中國十五省省圖，圖上標註了一百一十五座大城市的位置以及耶穌會士在中國建立的近二百座教堂。

《中國哲人孔子》一書的出版在歐洲引起強烈反響，使孔子及其儒家學說得到較為系統的介紹。拉丁文版後，各種文字的節譯本相繼推出，僅1688-1689年出版的法文節譯本和評論即有西蒙·富歇(Simon Foucher)的〈關於賢哲孔子道德觀的一封信〉、雷吉斯(Regis)的〈評《中國賢哲孔子》〉、貝尼埃(Francois Bernier)的〈中國賢哲孔子〉、庫贊(Louis Cousin)的〈中國賢哲孔子的道德觀〉。⁽⁵⁶⁾1691年，英國也出版了一個英文節譯本，叫做《孔子的道德》。⁽⁵⁷⁾從各種文字譯本的出版來看，這部書的閱讀者不限於學界，更不限於教士。歐洲許多知名學者對該書的出版給予積極評價。德國著名思想家、科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在評價該書時這樣寫道：

這部著作並非由孔子親自寫成，而是他的弟子將其言論加以收集、編輯而成。這位哲學家超越了我們所知道的幾乎全部希臘哲學家的時代，他總有著熠熠閃光的思想 and 格言。例如，他說惟有在嚴冬裡觀察保持綠葉的大樹，人才能明白事理。同樣，在平靜和幸福的日子裡，所有的人看上去似乎都是一樣，但正是在危險和混亂中才能看到大智大勇之人。⁽⁵⁸⁾

萊布尼茨對附在全書後面柏應理編著的〈中國皇朝紀年表〉給予極高評價。1687年12月，他在向朗德格拉夫·恩斯特(Ernest Landgrave)介紹時如此寫道：

附於本著末的中國編年史極其重要。因為根據一般的時代計算法，我們覺得諸如伏羲和黃帝那樣的第一批中國君主距洪水發生的時代太近了。這無疑將迫使我們更主張採納《聖經》七十子希臘文本而不是希伯來文本的《聖經》，因為耶穌會士們自己也承認，至少黃帝的歷史不會有疑問。⁽⁵⁹⁾

他進而認為：“除了猶太人之外，中國人在他們史書的確切性和古老性方面超過了其他所有民族，因為他們的政府幾乎是無間斷地延存下來的，雖然其中也出現了一些變化。”⁽⁶⁰⁾美國學者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認為柏應理的《中國哲人孔子》曾對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產生過積極影響。⁽⁶¹⁾另一位德國學者門策爾(Christian Mentzel)也曾深受〈中國皇朝紀年表〉的影響。門策爾寫過一篇關於中國歷史的著作，文中用漢字列出了每個皇帝的名字，清代的皇帝還給出了廟號，所有年代都使用中國的干支紀年法。據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推測，門策爾這些都是從柏應理所著〈中國皇朝紀年表〉中學來的。⁽⁶²⁾

《中國哲人孔子》對法國啟蒙思想家影響很大。貝尼埃在閱讀了《中國哲人孔子》後寫道：

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篤、忠實、虔敬、慈愛、親善、正直、禮貌、莊重、謙遜以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為其它民族所不及，你看了總會感到興奮，他們所依靠的祇是大自然之光，你對他們還能有更多的要求嗎？⁽⁶³⁾

伏爾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在《風俗論》中介紹孔子學說時，顯然利用了《中國哲

人孔子》一書。伏爾泰寫道：“在他的第一部書中，他說為政之道在日日新。在第二部書中，他證明上帝親自把道德銘刻在人的心中，他說人非生而性惡，惡乃由過錯所致。第三部書是純粹的格言集，其中找不到任何鄙俗的言詞，可笑的譬喻。”⁽⁶⁴⁾孟德斯鳩在閱讀《中國哲人孔子》後做了筆記，手稿在1958年被發現，手稿上有這樣一句話：“柏應理神甫認為，對於堯以後的歷史，不應懷疑，因為所有提到的事件，都有確切的日期和甲子紀年。因此，自堯至今年，即1713年，這段歷史已延續四千零七十三年。”⁽⁶⁵⁾可見孟德斯鳩在中國歷史紀年方面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柏應理的觀點。

《中國哲人孔子》一書在英國流傳極廣。著名政治家、散文家坦普爾(William Temple)在仔細閱讀該書後這樣評價“孔子的著作”：

孔子的著作，似乎是一部倫理學，講的是私人道德，公眾道德，經濟上的道德，政治上的道德，都是自治、治家、治國之道，尤其是治國之道。他的思想與推論，不外乎說：沒有好的政府，百姓不得安居樂業，而沒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會使人滿意。所以為了人類的幸福，從王公貴族以至於最微賤的農民，凡屬國民，都應當端正自己的思想，聽取人家的勸告，或遵從國家的法令，努力為善，並發展其智慧與德性。⁽⁶⁶⁾

坦普爾對孔子的為人推崇備至，他說孔子是一位極其傑出的天才，學問淵博，德行可佩，品性高超，既愛自己的國家，也愛整個人類；他還稱讚孔子的文風是“詞句典雅，巧譬善喻”⁽⁶⁷⁾。他還寫過一篇題為“討論古今的學術”(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的文章，在文中他把孔子思想與希臘哲學相提並論，認為“希臘人注意個人的或家庭的幸福；至於中國人，則注重國家的康泰”⁽⁶⁸⁾。

(二)沈福宗雖然以天主教徒的身份現身歐洲，但他與對東方感興趣的歐洲各界人士的積

極接觸，對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和歐洲早期漢學的發展均極具意義。沈福宗在法國期間，與其交往的即有政界和科學文化界等各界人士。法蘭西學院東方學家埃貝洛(Barthelemy de Herbelot)對中國歷史文物很感興趣，他曾與沈福宗多次交談，1697年，即在他去世兩年後，其主編的《東方文庫，或有關東方人民知識一切內容的萬有辭典》出版，其中收錄了許多有關中國的內容。該辭典在歐洲廣為傳播，成為當時瞭解中國的重要參考書。

與沈福宗接觸的法國政界人物就是前揭的法國首相盧瓦，他們應是在路易十四舉行的宴會上相識的。盧瓦與其前任柯爾伯一樣，也主張派人前往中國，而摸清中國的一些情況無疑對派遣極為重要。所以，盧瓦在結識沈福宗後，馬上讓法國皇家科學院向沈福宗、柏應理羅列了一張包括三十五個有關中國問題的調查提綱，這些問題大致包括：

中國的年代學、中國歷史的權威性和準確性、經緯度觀測；中國人在數學、占星術、哲學、醫學以及把脈等方面的優缺點；茶葉、大黃、其它藥物和奇異植物；中國鳥類、動物和歐洲的同異；火炮的樣式和使用方法，其它防禦武器和煙火；絲綢、棉布、陶瓷的製造方法，印刷術、羅盤的使用方法；北京、南京、廣州等主要城市的規模、人口；房屋、花園、街道、噴泉；礦藏的種類；長城、港口、氣候，皇帝的財富，各省的地理狀況和宗教等。⁽⁶⁹⁾

後來法國耶穌會士在華的科學活動，與這個調查提綱有很大關係。

訪英期間，沈福宗與英國東方學家湯瑪斯·海德(Thomas Hyde)過從甚密。海德為牛津大學東方學家，是該校阿拉伯語、希伯來文教授，1665-1701年任牛津大學博多利安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館長，還兼任宮廷東方語翻譯。海德雖然不懂漢語，但他對中國有濃厚興趣，所

以在英王詹姆斯二世舉行的宴會上與沈福宗結識後，就邀請他到牛津大學。海德此舉，除想借機向沈福宗瞭解有關中國情況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讓沈福宗幫忙整理牛津大學博多利安圖書館所藏中文書目。隨着中西交往的頻繁，自17世紀起，就有一些中國古籍和文獻被博多利安圖書館等英國其它圖書館收藏，“但是沒有一個讀通經史的英國人告訴讀者如何使用那些典籍”⁽⁷⁰⁾。這種情形，無疑是身為圖書館館長且對中國有着濃厚興趣的海德所不願看到的。如今既然沈福宗來到倫敦，海德自然不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沈福宗的確幫助整理、編輯了博多利安圖書館所藏中文書目，館中保存至今的1686至1687年購書賬目中還有這樣一條記錄：“請一位中國人編寫中文書目支付他的食宿六鎊。”⁽⁷¹⁾而這位“中國人”就是沈福宗。

沈福宗在牛津期間，除整理編輯館藏中文書目外，還曾教授海德學習漢語，並經常用拉丁語同海德進行交談，內容涉及到中國的度量衡制度、中國的地理位置、中國歷史、漢語語法及漢字的特點以及一些中國遊戲等。正是得自沈福宗的有關中國的種種研究材料，海德於1688年出版《中國度量衡考》，1694年又出版《東方遊藝》。在《東方遊藝》中，海德對中國的象棋作了極為詳細的介紹，不僅繪有棋盤，用中文標出所有棋子，而且對下法和規則作了講解；書中還介紹了圍棋和樽棋，以及另外兩種中國遊戲“陞官圖”和“楊六四捍”。書中所介紹的這些中國遊戲，除象棋和圍棋外，其餘遊戲在如今的中國亦很少有人瞭解。⁽⁷²⁾因此，海德的這些記載尤其彌足珍貴。海德對從沈福宗那兒獲得很多中國知識一事並不諱言，他在1694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中這樣談到沈福宗：

中國南京人沈福宗使我懂得很多中國知識，他由柏應理神父從中國帶來。而近年來與同一耶穌會士在歐洲停留，並編譯巴黎版的中國哲學著作。這個年輕人現年三十歲，性情善良，學習極

其勤奮。他為人禮貌、熱情，有中國文化和哲學方面的良好素養，讀過用漢文寫的各種各樣的書，而他在中國時就早已是懂得拉丁文的少數人之一。⁽⁷³⁾

據說海德還編寫過一本名為“中國雜錄”的書，曾在歐洲漢學界廣為傳誦。我們可以這樣說，海德被稱為“英國東方學之先覺”⁽⁷⁴⁾是名至實歸，“視之為英國漢學研究之濫觴並不為過”⁽⁷⁵⁾。

沈福宗在英國期間，與英國科學界人士也有交往，其中之一就是英國當時的著名科學家波義耳（Robert Boyle）。波義耳為英國皇家學會的創建人之一，他對中國的事物很感興趣，讀過許多來華傳教士有關中國的著述，像衛匡國的《中國新圖志》、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卜彌格的《中國植物志》等。1671年，波義耳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得到一本南明時的《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大統曆》，可能是因其好友海德此時正擔任牛津大學博多利安圖書館館長的緣故，在1672年波義耳把它贈給了博多利安圖書館，這本帶有波義耳簽名的曆書，迄今仍保存在那裡。⁽⁷⁶⁾而波義耳與沈福宗結識、會面，中介人就是海德。海德在1687年7月26日致波義耳的信中向其推薦了沈福宗，並提到沈福宗幫助整理的中文書目中，除有些關於孔子的書外，大多數都是醫書。據推測，這些中國醫書很可能是東印度公司的船隻經過江蘇、福建這兩個沿海省份時所購得的。⁽⁷⁷⁾波義耳對中國醫學非常感興趣，曾希望能有機會得到中國醫書著作，藉此為歐洲醫學提供借鑒。⁽⁷⁸⁾雖然海德把沈福宗介紹給波義耳，是否與波義耳本人對中國醫書的興趣有關，尚待新材料證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二者確曾晤面。⁽⁷⁹⁾而他們見面交談的話題，自然不會僅局限於中醫，它們無疑都會加深波義耳對中國的瞭解，進而對英國早期漢學的發展起到推逐作用。

英國科學界中與沈福宗有過交往、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還有一位，他就

是著名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胡克定律的發現者胡克（Robert Hooke）。胡克在物理學、天文學以及科學儀器的研製方面成就斐然，他不僅發現了胡克定律，使波義耳飲譽英國乃至世界科學界的波義耳定律也是在胡克的協助下發現的。胡克通過與沈福宗長談，不僅對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方面知識有了深刻瞭解，尤其重要的是，胡克受到從沈福宗那裡瞭解到的中國自然哲學中有關波動理論的啟發，提出了光的波動說。⁽⁸⁰⁾

沈福宗滯留歐洲近十年，雖然他是以耶穌會教徒的身份出現，但他卻在法、英等國進行了積極的學術交流。通過教授中文、討論中國問題和整理牛津大學博多利安圖書館中文書目等活動，他向歐洲東方學者介紹了中國度量衡、中國遊戲、中國的偶像，中國人對神、天堂和地獄的概念，中國的刑法、航海指南針以及文學、書籍、紙張、古代印刷、書信等方面知識，增強了歐洲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在華傳教事業的關注。孟德衛認為“沈的旅程在提昇歐洲人對華興趣和主持耶穌會在華宣教方面成績斐然”⁽⁸¹⁾，確為的論。總之，沈福宗的歐洲之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時至今日我們亦不應忘卻。

【註】

- (1) [法] 亨利·柯蒂埃著，唐玉清譯、錢林森校：《18世紀法國視野裡的中國》，頁145，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據范存忠教授考證，沈福宗是“第一個訪問英國大學的中國人”，見氏著《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頁10，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至於最早到英國的中國人，美國學者拉齊(D. Lach)指出，早在1588年，已有兩個中國人隨航海家卡文迪許(Cavendish)到了英格蘭。參見D.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p. 791, p. 742. 轉引自張國剛等：《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頁23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2) [英] 赫德遜著，李申等譯：《歐洲與中國》，頁267，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3) 許明龍：《歐洲18世紀“中國熱”》，頁17，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4)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180，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39，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基督教辭典》，頁40，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但也有的作“信末”，參見[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311，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頁95，臺北：商務印書館，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丁光訓主編《基督教文化百科全書》(頁107，濟南：濟南出版社，1991年)。
- (5) 關於柏應理的生日，學界存在不同說法，大致有1620年、1622年、1623年、1624年、1628年等，見[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312註①，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Peter Gordts 經過縝密考證後認為柏應理出生日應為1623年5月31日(Jero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pp. 21-23, Nettetal: Steyler-Verlag, 1990)，這裡從之。
- (6) 也有著作認為柏應理是在1658年隨衛匡國離歐赴華的，同行者有南懷仁等，見莫東寅《漢學發達史》(頁51，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頁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許明龍：《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頁150，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實際上，衛匡國是在1657年4月離歐重返中國，同行者有南懷仁等人，兩批人馬，不可混為一談。
- (7) [意] 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馬西尼(Federico Masini)著，蕭曉玲、白玉崑譯：《意大利與中國》，頁17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 (8) (9) 鄭天祥主編：《羅文藻史集》，高雄教區主教公署印行，民國六十二年。頁5；頁7。
- (10)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197，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
- (11)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頁760，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12) 中文名亦作“羅曆山”，具體行跡見[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189-191，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13)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189，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
- (14) 費賴之則稱鄭瑪諾幼從衛匡國赴羅馬。見[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380，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15)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195，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
- (16) 許明龍：《歐洲18世紀“中國熱”》，頁20-21，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7) 黃穀編譯：〈清初旅歐先行者——沈福宗〉，《紫禁城》1992年第5期(20-22頁)。但方豪認為祇有時年十九歲、聖名為安德的沈姓中國教徒隨卜彌格赴歐，另一聖名為若瑟的中國教徒未能成行。見氏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頁307，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
- (18) 方豪：《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頁380，臺北：燕京印書館，1969年。
- (19) Jero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pp. 77-79, Nettetal: Steyler-Verlag, 1990.
- (20)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203，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
- (21) 莫東寅：《漢學發達史》，頁52，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 (22) 李問漁編：《墨井集》卷三，〈三巴集〉。
- (23)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209，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
- (24) 陳垣：〈吳漁山與王石穀畫跋〉，《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二十號。
- (25) 關於吳曆晉陞司鐸的地點，學界存有不同看法：方豪認為是在南京(見氏著：《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152，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但費賴之則認為在澳門(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頁397，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目前大多學者傾向認為吳曆晉陞司鐸是在澳門。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論述，請參拙著〈吳漁山(曆)雜考〉，《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7期第107-110頁(2003年夏季刊)。
- (26)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180，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但也有人認為柏應理一行從澳門啟航乘坐的是葡萄牙商船，見(法)雅克·布羅斯著，耿昇譯：《發現中國》，頁113，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黃谷亦認為柏氏是在1681年12月3日乘葡船“聖安多尼奧號”啟程赴歐，隨柏應理西行的除沈福宗外，還有一位中國人同行，但行至爪哇時，這位中國人改變了主意，打道回國。見黃穀編譯：〈清初旅歐先行者——沈福宗〉，《紫禁城》1992年第5期(20-22頁)。
- (27) 關於沈福宗到達歐洲的具體時間學者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是1685年到達歐洲，有人認為是1684年，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則認為在1683年10月抵達荷蘭，見氏著《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江文君等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頁112。
- (28) (29) (30)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頁69；頁67；頁67-68。
- (31) (32) (33) Jero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Steyler-Verlag, 1990. p. 128; p. 129; p. 130.
- (34) 關於這一計劃的具體內容可參見[法]維吉爾·畢諾(Virgile Pinot)著，耿昇譯：《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頁33-35，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35) 其中居伊·塔查爾(Guy Tachard)到達暹羅後，因負暹羅國王之命返回法國，所以到達中國的實際祇有五位。——筆者註。
- (36) 王漪：《明清之際中學之西漸》，頁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37) [法]衛青心著，黃慶華譯：《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上)，頁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 (38) H. Bernard, “Le voyage du Père de Fonteney au Sian à la Chine, 1685-1687, d’après des lettres inédites”,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de l’Aurore* (《震旦雜誌》), 3rd ser., 3 (1942), pp. 227-280. 轉引自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1582-1793)》，頁20，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39) 王漪：《明清之際中學之西漸》，頁7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40) [法]戴密微著，胡書經譯：〈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載張西平編：《歐美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183-222頁)，頁188，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 (41) 許明龍：《歐洲18世紀“中國熱”》，頁17，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42) Jero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p. 133, Nettetal: Steyler-Verlag, 1990.
- (43) 徐劍梅：〈“倫敦眼”牛津的中國色彩〉，新華網：2004-06-02。
- (44) 徐劍梅：〈“倫敦眼”牛津的中國色彩〉，新華網：2004-06-02。孟德衛也主張該畫是柯內勒所畫。見[美]孟德衛著，江文君等譯：《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頁112-113，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 (45) 但也有學者認為沈福宗與柏應理同船返華，沈福宗途中患病，1692年9月2日在莫桑比克附近去世，而柏應理則於1693年5月16日在果阿附近海面身亡，

- 再未踏上中土。方豪神父則認為沈福宗是在1694年偕耶穌會士紀理安(P. Stumpf)同舟回華。見方豪：〈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載《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379-402頁)，頁388，臺北：燕京印書館，1969年。
- (46) Jero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p. 139, Nettetal: Steyler-Verlag, 1990.
- (47) [德] 利奇溫著，朱傑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頁18，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
- (48) [法] 馬布里：《就政治社會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經濟哲學家質疑》，頁81-82，巴黎1768年版。轉引自許明龍：《歐洲18世紀“中國熱”》，頁299，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49) (50) [德] 利奇溫著，朱傑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19；頁16。
- (51) Jerome Heyndrickx,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p. 124, Nettetal: Steyler-Verlag, 1990.
- (52)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頁200，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
- (53) (54) 轉引自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8年，頁201；頁69-70。
- (55) 利瑪竇國際學術會議秘書處編輯：《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頁519-520，臺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1983年。
- (56) 孟華：〈1748年前的法國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學人》第四輯，頁354-355，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
- (57) 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頁11，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
- (58) 《萊布尼茨全集》卷一，轉引自李長林：〈柏應理在歐洲早期漢學發展中的貢獻〉，載《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1期。
- (59) (60) [法] 維吉爾·畢諾著，耿昇譯：〈中國文化對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的影響〉，《國際漢學》第1輯(135-16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152。
- (61) 李申：〈一部試圖總結和探討東西方文化一致性的著作——評介《萊布尼茨與儒教：尋求一致》〉，《中國史研究動態》1987年第0期。
- (62)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inology*, pp. 238-239, Stuttgart, 1985.
- (63) 轉引自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頁11，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
- (64) [法] 伏爾泰著，梁守鐸譯：《風俗論》(上)，頁77，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 (65) 許明龍：《孟德斯鳩與中國》，頁50，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 (66) (67)(68) 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5。
- (69) 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1582-1793)》，頁13-14，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原文見Virgile Pinot, *Documents inédits relatifs à la connaissance de la Chine en France*, pp. 7-9, Paris, 1932. 中譯文見[法] 維吉爾·畢諾(Virgile Pinot) 著，耿昇譯：《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頁502-504，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70) (71) 熊文華：《英國漢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頁2；頁19。
- (72) 許明龍：《歐洲18世紀“中國熱”》，頁22，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 (73) Thomas Hyde, *Praefatio ad lectorem, Mandragoras seu historia shahilumdi*, Oxford, 1694. 轉引自潘吉星：〈沈福宗在17世紀歐洲的學術活動〉，《北京教育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年第3期。
- (74) 莫東寅：《漢學發達史》，頁53，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 (75) 熊文華：《英國漢學史》，頁20，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
- (76) 中國學者韓琦1995年春到牛津大學圖書館時，目睹到該書。見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1582-1793)》，頁47註③，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77) 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1582-1793)》，頁49，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78) Robert Boyle, *The Works of the Honourable Robert Boyle*, Vol.2, pp. 161-162, London, 1772. 轉引自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1582-1793)》，頁47，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79) 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1582-1793)》，頁49，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80) 關於此方面的研究，請詳參潘吉星：〈沈福宗在17世紀歐洲的學術活動〉，《北京教育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年第3期。
- (81) [美] 孟德衛著，江文君等譯：《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頁112，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